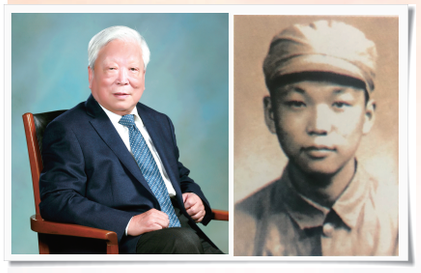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
www.jfdaily.com
解放日报

红色记忆 光辉足迹

——本市离退休干部讲述解放上海的亲历故事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也是上海解放70周年。市委老干部局开展“乐龄申城·五心行动”。紧扣中心大局，开展正能量系列活动。以“赞成就、助发展、当先进、作表率”为主题，通过征文、建言献策、讲好故事、文艺展演、书画摄影等形式，组织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开展一系列“看”、“听”、“讲”、“议”等活动，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。

广大老同志积极响应号召，忆往昔、赞今朝、望未来，讲述在解放上海时亲身经历和体验的故事，抒发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可感的红色历史画卷。让我们重温红色记忆，追寻光辉足迹，深切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，铭记地下党工作者，致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畅想展望美好的明天，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。



我在上海解放的前前后后

李仁杰（87岁）

我于1946年10月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年14岁。1948年初任党支部委员，并被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主席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开展“反美扶日”等学生运动，遭学校多次警告，最后被父亲锁在家里。6月底，在“我要革命”的思想指导下，我锯断了锁链，伺机翻过铁门从家里逃出。

9月初，交通员带我经扬州，进入解放区。经两个多月的跋涉，我终于抵达在合德的华中党校。经短暂学习后，年底被派任为蒋管区的地下交通员。1949年1月1日，我从益林乘船出发，经无锡转赴上海，接上关系，带一位同志返解放区。其时已是3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封锁长江，我们转赴镇江，白天侦察地形，半夜偷渡，返回高邮华中党校。

5月1日，我们渡江赴丹阳继续学习。当时华东局就驻在丹阳。为了准备解放上海，党中央和华东局早在解放济南后，就开始组织一支“南下干部纵队”，总人数达到8000人左右。在准备工作中，陈毅司令员在5月10日亲自向全体干部作报告，强调要给上海人民一个好的“见面礼”。

1949年5月24日，解放军开始进入市区，至5月27日全市解放。我们在5月26日从丹阳乘火车出发到南翔。地下党组织很多车辆把我们送入市区，我们在27日晨进入交通大学，住在新文治堂，当时这个礼堂还未建成，桌椅等都还未装，我们都睡在水泥的地上。

不久我被分配在青年团系统工作。我们身穿解放军的黄色军装，胸前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胸章，臂上佩戴着红色的“上海军管”臂章，向伪三青团机关里的旧人员宣读了政策，清点了人员和财产、物资，登记造册。之后，我被分配到青年团的南一区工作队，队长是钱其琛同志，工作队员共十余人，年龄在17岁到20多岁之间。

我们的工作，主要是发动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到党的中心工作中去。如6月5日，全市打击银元贩子，专门人员在证券大楼对银元贩子打击后，我们就发动广大团员、积极分子到学校、街头进行宣传，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。还有在7月6日组织团员、青年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，以后又参加了开国庆典以及“二六轰炸”后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等。当时交通大学、圣约翰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南洋模范中学、复旦中学、南洋中学等学校都有地下党组织，我们把地下党组织公开，并开始建立青年团组织，发展团员。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学校，我们通过发动群众，发展培养积极分子，建立团组织。1950年后，又到工厂等单位开始建团工作。我们还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，发动广大党员、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参加华东革命大学、党校、团校等。我负责组织和秘书工作，通过各个渠道，输送了至少几百人参加革命工作。

那时我们工作热情高涨，不分昼夜。我们住集体宿舍，吃食堂饭菜，工作上相互帮助，生活上互相照顾，其乐融融，至今仍是难忘。

亲历上海战役

张有才（87岁）

1947年初，我参军成为陈毅领导的三野十兵团、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0团的战士，参加过盐城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、福州战役、解放厦门等数十场大小战役、战斗，流过血、负过伤。现在回忆起自己的经历，感慨万千，特别难忘的是上海战役。

上海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，要坚决消灭敌人，又要将这座城市完整地交给上海人民。在攻打市内时，不准用重武器大炮轰，只准用轻武器、步枪等机械，才能使城市建筑、工厂、码头、居民住宅等得以保存下来。

我当时所在的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0团，主要对市郊——月浦、宝山、吴淞口的战斗。这是场硬仗、恶战，这一地区，国民党军占有密集的钢筋水泥地堡群，构成纵深防御体系；又设有铁丝网、木城壕沟、地雷等障碍；加之地形平坦，公路纵横交错，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；并得到飞机、舰炮和要塞炮火的支援。我军在月浦、刘行三天激战中伤亡数千人。我是其中之一，头部、腰部均受伤。

后来，我军调整了作战部署，用我师三个团对月浦镇形成三面包围，黄昏发起攻击。敌军隐蔽在树林草堆，地包中的地堡组成密集交火网顽强抵抗。我们部队在血雨火海中浴血奋战、奋勇冲击，迅速攻占了月浦镇前沿部分阵地。第二天凌晨，师长、政委分别到前沿阵地部署，继续攻击。以三个团的兵力分别自西、北、东三个方向同时猛攻，以火炮平射挡住冲锋道路的敌军坦克。各突击队乘势发起冲击，突破守军阵地，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于第二天拂晓攻占月浦市区。

5月23日，我军继续攻击月浦镇南侧高地守军，担任主攻的我师夜以继日地进行近距离作业。战士们分工有序，不断推进，把工事一直挖到敌人守军碉堡前四五十米处，都能听得对面敌人讲话。随后，先以炮火对高地实施摧毁性射击，趁炮兵射击之际，我团各营连用淮海战役的打法“枪炮送炸药”。随着爆破声响，我们步兵像脱弦之箭，直插敌人守军地堡，立即攻占了高地，敌人守军52军一个营被歼。

敌人为夺回该高地，第二天以一个多团兵力，在多辆坦克掩护下，连续三次向小高地反击，坚守高地的我三营遭到严重伤亡，全营只剩下七八十人，激战一整天，高地仍在该营坚守中。

我们军在25日下午全力向吴淞、宝山猛打猛追，到了26日拂晓，占领宝山城，俘敌52军数千人，缴获军舰一艘。接着攻打吴淞，残敌数千人，与兄弟部队会合。

我军在对月浦、吴淞、宝山的战争中，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，经过反复争夺，才最后取得胜利。

我们现在的生命岁月静好，是无数革命先烈在替我们负重前行，我们才能生活在幸福的祖国。我想念着各个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，是他们用青春、生命换取了胜利，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。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！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永垂不朽！

我们在“瓷器店里打老鼠”

刘石安（85岁）

1949年5月12日，解放上海外围战打响，我是第九兵团20军59师175团二营五连的一名战士。当时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认真领会了毛主席的指示，在部署如何解放上海时，用形象的语言阐释了怎样实现军政全胜：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完整地解放上海，又要歼灭敌人；既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，让敌人毁城跑掉，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，使人民遭殃。大家要把解放上海这座大都市看作在瓷器店里打老鼠，既要打到老鼠，又不要损坏了珍贵瓷器，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。

5月24日的上海，阴雨绵绵。九兵团第20军59师渡过黄浦江，从江南造船厂码头上岸，沿西藏南路一直打到西藏中路，晚上解放了南京东路、福州路一带。战斗暂告一段落，但战士们睡觉成了问题。

上海解放前夕，陈毅在丹阳县城的一间大仓库里，面对穿着不同服装的2000多名军政干部组成的上海接管纵队，作《入城守则》报告。他说：“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，是我们解放军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。见面礼搞不好，是要被人家赶出来的。记住，我们野战军，到了城里不准再‘野’，纪律一定要严！”因此，战士们进入城区后，没有人在市区买东西，甚至部队吃的饭菜，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，再送到市区。为了不惊扰市民，夜晚南京东路上，蒙蒙细雨中，疲惫至极的战士，和衣抱枪，睡卧在马路两侧。

住在附近的居民与路过的行人都看到了这难忘的一幕。南京路上，上海滩，曾驻扎过军阀军队、日本侵略者军队、国民党军队，却从未看到露宿街头的军队。他们秋毫无犯，不进市民的家门，睡在马路上，而且团长、师长也与普通战士一样。有一位民主人士在解放军入城的第二天早晨，打开窗户，看到睡在马路上的部队，不无感慨地说：蒋介石再也回不来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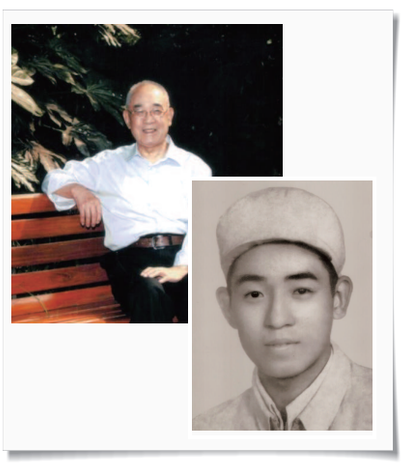
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配合攻城部队，以刘晓、刘长胜为首的地下党组织，为把一个大上海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，做出了奉献。5月25日，解放军攻占了苏州河以南，而有数万敌军在苏州河以北，从外白渡桥到造币厂桥沿线设置阵地，占据了制高点和一些仓库、大楼，企图固守。

当日清晨，时任地下党策反委员会委员的田云樵找到第27军81师师政委罗维道。得知对面是国民党第51军，田云樵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部队。他自告奋勇，联系了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的王仲民，商量策反方案，并得到九兵团第27军军长聂凤智的同意。几经周折，王仲民终于走进了敌51军军部，见到了刘昌义。刘昌义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、第51军代军长。他是国民党上海军界的最高领导。

王仲民表达了劝降的意思。刘昌义再三考虑后说：“你是共产党派来的，但你不能代表共产党，我要自己跟共产党谈。”

当天下午4时，刘昌义带着副官及王仲民，来到解放军阵地，与27军军长聂凤智见面。谈判一直持续到25日深夜，最终达成了初步协议，刘昌义放下武器投诚，51军限时在指定地点集中。5月26日凌晨1时，陈毅回电，下达四点指示：一是接受刘昌义的投诚，二是他的部队于5月26日集结到江湾地区，三是撤出去的地区由解放军接防。最后指出，如果有不执行这个命令的情况发生，由解放军解决。

5月26日上午8时许，刘昌义部队开始从苏州河北岸向东北方向撤走，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接管这一地区。苏州河北岸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。



到上海，这是梦又是很真实的事

赵一峰（90岁）

淮海战役结束了之后，领导告诉大家，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，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，建立新中国，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，毛主席说，这是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以后革命的道路还有很远，要做好思想准备，适应新形势的变化。

解放军打过长江以后，江南广大地区的大城市有上海、南京、杭州，历史名城有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宁波等地，江南广大农村是有名的渔民之乡，这些地方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，将来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地方。

过去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巢，我们去，要将这些地区建设成革命的支柱，认识这些很重要。

过去行军靠两条腿，迈开铁脚板，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，现在不同了，随着战争的胜利，我们有了汽车，火车，轮船，比走路快多了，也舒服多了。特别是我们广播电台的编辑、记者，一路走一路开展工作，经过曲阜的孔府、孔林、孔庙，来到战略要地徐州，在淮阴韩信、淮安周恩来的出生地，以及千年大运河、扬州的名胜、镇江的金山寺，我们传播了革命的声音。常州出才子，无锡是小上海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苏州的故事就更多了。我们走在路途中，不时引起欢笑，忘记了旅途疲劳，增加了很多知识，真有点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的感受。

丹阳集训是我们由农村走向城市生活的重大转变。

在丹阳，我们进行了思想精神、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集训，我们学习入城纪律、注意事项，了解了上海的各种情况，特别是听陈毅司令员的动员报告，他讲入城纪律时，很严肃，让人牢记，讲上海情况，又讲得很风趣，不时引起掌声和笑声。他说，上海是有名的世界东方乐园，那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。中外投资家都到上海来闯天下。强盗、投机份子、帮会、土匪、流氓、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，相当复杂。当然还有百万工人大军、党的地下工作人员、进步人士，我们要依靠他们一起管理好大上海。陈毅同志的报告，是我们进上海的一次政治动员，让人牢记不忘。我们在丹阳农村住了一个月，在这里接触了江南人的生活习惯，看了江南美丽的田野。更坚定了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信念。

到上海，这是梦，又是很真实的事。过去在辽宁、山东，一些城市住过，到上海后，真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，不知东南西北了，什么都很新鲜。女的叫小姐，男的叫先生，女的抹口红，男的戴礼帽。我的领导李介夫，他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，要一样一样介绍怎么吃，自来水、煤气怎么用，公交车、电车怎么乘等等。

到上海后，觉得自己能力不适应，对陈毅讲的“进城之后要学习，学习，再学习”的讲话深有体会。1950年春节之后，我读夜校，读了初中文化课，读会计业务课，随着工作岗位变化，又学政治经济学、党史。1956年到华东局党校学习了10个月后，我对工作要求基本上适应了，由于学习尝到甜头，获得知识，我养成了学习的习惯，终生受益。

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上海人。

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

俞仁信（93岁）

1949年3月，我们上海法学院被迫停课，学生纷纷离校回家，我们几个参加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同学决心留在学校，在市学联及校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，参加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，开展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。炮声隆隆，硝烟弥漫，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日夜盘旋在上海上空，解放大上海的外围战打响了，全上海人民沸腾了，大街小巷，人们奔走相告，解放军要来了，上海马上要解放了，兴奋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在学校的小阁楼里，我们用简陋的油印机，印发“解放军约法八章”“告上海市民书”等宣传单。晚上，从居民楼高层窗口撒下，散发在大马路上。另外，我们分组在深夜去小巷，将宣传单张贴在电杆木或广告栏、阅报栏里。在电车轨道上、大马路上，我们用白漆写上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”“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大救星”“毛主席万岁”“打到广州去，活捉蒋介石”等醒目大字标语。

我们还成立护校队，日夜24小时轮流在校内组织巡逻、放哨，防止散兵游勇及特务的破坏，协助学校囤购粮食、油盐、腐乳及榨菜等食品，防止断电断水断粮。

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加紧破坏学生运动，到各学校搜捕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，进行残酷迫害，市学联为了保护我们安全，把我们从江湾路原校转移到四川北路麦拿里1号居民区继续开展工作。

5月25日，一声惊雷打破了压在人民心头的枷锁。凌晨一时左右，为迎接解放军进城，我们彻夜未眠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，一群群国民党残兵败将手摇白毛巾，从江湾五角场向四川北路涌来，朝苏州河南岸走去，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，他们不得不缴械投降。就这样，苏州河北岸的最后一股顽匪终于被彻底消灭，上海正式宣告解放。

一队队臂绕红布的解放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大街小巷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们就佩戴事前发下的“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”的胸章，走上街头，为迎接解放军入城而开展了积极的工作。

我们协助解放军搜捕国民党残匪逃兵，在国民党特务、军官的住宅里搜出枪支弹药、炸药、收发报机等军用物资。维护偌大的上海交通秩序刻不容缓，我们配合人民纠察队参加机动巡逻队，每天乘坐吉普车巡逻在辖区内的大街小巷，使全市各大动脉能日夜不停地正常运转。我们还进行义卖慰劳解放军，有组织地将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”“反对本本主义”等小册子、纪念画片、小工艺品等在大光明电影院、大世界及各大公园进行义卖。

6月初，在上海威尔卫路的叔叔家中，我与两位离散八年的哥哥相聚了。他们参加革命，多年杳无音讯，亲人一朝相见，抱头痛哭，真是悲喜交集。感谢党与解放军在给上海人民带来光明与幸福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小家带来了莫大的幸福！

南京路传出红色电波

杨俊（92岁）

我于1927年11月出生于上海松江。1942年，不满16岁的我成为南京路上新新公司罐头部的一名员工。新新公司是旧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，自行设计、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，后改称“凯旋电台”。上海解放前，我参加过1946年的“六二三”反内战示威大游行，亲历1947年的“二九”血案。1949年4月，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47年2月9日，上海地下党职委领导百货业职工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“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”成立大会。当天上午，未到开会时间，可容纳四五百人的会场已被人挤满。郭沫若、邓初民等应邀做好演讲准备，提前来到劝工大楼。大会尚未开始，一批特务、暴徒拿着伪造的请柬，冒充各产业工会代表混入会场。他们掀翻签到桌，抽出袖笼里的木棒铁棍砸断长条椅，把木凳砸向主席台，会场顿时一片狼藉。另一批两百多人预先埋伏在劝工大楼的楼梯上、大门口和附近的马路上的暴徒也纷纷动起手来，手持榔头、铁尺，见人就打，见物就毁，还抓起椅子脚、痰盂、茶杯向职工头上、身上乱掷乱打。赤手空拳的职工、工会领导和暴徒们扭打在一起。一些职工手挽手组成人墙，阻挡冲向主席台的打手，与手持凶器者对垒。有的同志头部流血，有的眼睛被打肿，有的手脚受伤，但没有一人后退。郭沫若、邓初民在工会干部保护下，从劝工大楼脱险出来。当暴徒退出会场，我走下楼刚出大门口，就被特务们一阵拳打脚踢。我腰部受了重伤，躺了十几天。而让我至今仍无法忘怀的是，永安公司的职工梁仁达怒斥这群暴徒，被从三楼拖拽至一楼，一路拖一路打，楼梯上留下斑斑血迹。当天下午，年仅30岁的梁仁达因伤势过重而不幸牺牲，身后留下怀孕5个月的妻子。

1949年3月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公司地下党支部召开支委会，接到了控制“凯旋电台”并学会使用电台的命令，准备在迎接上海解放时发挥作用。当时我担任新新公司人民保安队大队长。5月24日的夜里，城市上空已经能听到隆隆的炮声。第二天凌晨，解放军进入了南京路。隐蔽在外的支部组织委员张啸峰匆匆赶来，他解开一个小纸包，取出了一叠印着“人民保安队”字样的红字白底布制臂章，又从贴身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又小又薄的打字纸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。我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签署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和欢迎解放军的歌词《我们的队伍来了》。我们的任务，就是赶紧将上海解放的喜讯向上海市民广播！

上海解放后，我先后在当时的嵩山和邑庙区委统战部、小北门街道、小东门街道、豫园街道工作。1987年离休后，我继续为党工作，曾任离休党支部书记15年，在市老干部大学政治经济班坚持学习了十年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。我运用自己革命经历，为年轻党员上党课。我还担任政治讲师团的讲师，经常到学校、少年宫、机关街道里弄社区去宣讲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至今已作了50多次报告，听讲者达1万多人次。

虽然我已经92岁了，但在有生之年仍要为党工作、为民服务，离休不离岗，争当党的政策宣传员。

本报社址：上海市延安中路816号 电话：（021）22899999 邮政编码：20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31－0001 上海市印刷：上报集团印务中心 电话：（021）56082146
驻京办事处地址：北京市北河沿大街43号 电话：（010）64043655 邮政编码：100009 定价每月：36.00元 今日零售：2.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3100004000004
解放日报一键订阅